

校园欺凌的影响与对策

——来自农村寄宿制小学的证据

吴要武 侯海波*

内容提要 近年来,由于农村义务教育资源布局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农村小学生尤其是那些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被迫选择寄宿制学校。本文使用北京大学等联合课题组于2015年10月在137所农村寄宿制小学所做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小学生遭遇校园欺凌的状况以及卷入欺凌对学生学业和心理健康的影响。我们发现,寄宿生尤其是低龄寄宿生卷入校园欺凌的风险更高;卷入欺凌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学习成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从提升教师受教育水平和责任心的角度,探讨了降低校园欺凌的办法。

关键词 校园欺凌 寄宿 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 人力资本

一 引言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作为今后的工作目标之一。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性因素是如何确保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这是由于如果学生在初中阶段因成绩差而辍学,就很难升入高中并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体,受教育水平低下不仅使青少年面对脆弱且高风险的未来,也不利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校园欺凌影响青少年的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增大了他们厌学和辍学的风险。

校园欺凌是指在同学间力量(或心理地位)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一方蓄意对另一

* 吴要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wuyw@cass.org.cn;侯海波(通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电子邮箱:herbhhou@foxmail.com。

方在身体、心理和财物等方面进行反复和恶意的损害（Olweus, 1997）。校园欺凌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其中，在发展中国家校园欺凌发生率更高，而且常因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误认为这是孩子之间的“戏耍”而被忽视。近年来，由于校园欺凌事件不断被披露，这一问题开始受到社会关注。校园欺凌威胁校园安全，破坏教学秩序和学习环境，已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2016 - 2017 年，国务院相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启动中小学欺凌专项整治行动。

对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国外已有丰富的成果。现有研究表明，遭遇校园欺凌不仅损害小学生的成长发育，还威胁他们成年后的身心健康。Heineck & Anger (2010) 发现，童年时遭遇欺凌的经历与成年后面临抑郁、焦虑和人格障碍等心理问题的风险正相关。Sourander et al.(2011) 追踪了 1981 年出生的 5351 名芬兰人，将其 8 岁时卷入欺凌状况与成年后的犯罪记录相匹配，发现欺凌能有效预测成年后的犯罪。Klomek et al.(2015) 和 Sigurdson et al.(2015) 发现，童年遭遇欺凌与成年精神疾病、自杀和犯罪高度相关，且影响强度随欺凌频率和强度的增加而递增。Agnew (1992) 认为，遭遇欺凌等负面事件使人陷入愤怒、沮丧、抑郁和焦虑，身体会分泌皮质醇等激素应对精神压力 (Ouellet-Morin et al., 2011)，但持续的应激反应使人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成年后还会引发精神或心脑血管疾病。因此，校园欺凌是威胁社会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校园欺凌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Heckman (2008) 指出，早期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最高，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本投资质量也决定了以后生命阶段人力资本投资的质量和收益率。遭遇欺凌会干扰甚至打断青少年学习的进程，使其成为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在工资和劳动参与率等方面有更不利的表现 (Drydakis, 2013)。

国内对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有关校园欺凌的影响的科学评估。近年来，农村的“撤点并校”迫使众多留守儿童寄宿求学，这些寄宿的小学生缺乏父母的日常监护，更容易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在小学阶段遭遇校园欺凌不仅对其小学时期的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这种影响还会持续到初中阶段，甚至诱发厌学和辍学等现象。中国特殊的城乡分割体制使农村的校园欺凌问题更加严重。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等机构开展的“农村寄宿制学校调查”，该项目于 2015 年 10 月在河北省和四川省的 5 个县的共 137 所小学开展抽样调查。本文评估寄宿对小学生遭遇欺凌的影响。研究发现，寄宿使小学生遭遇校园欺凌的风险增加；遭遇欺凌对小学生心理健康和学业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还从提高教师素质的角度探讨了解决校园欺凌的办法，发现教师学历水平和责任心与欺凌发生率显著负相关。

二 背景与假说

(一) 研究背景

1.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与留守儿童

在传统的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收入存在显著的差距;向市场经济转型打破了城乡壁垒,农村劳动者开始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外出农民工的规模从2002年的1.05亿人上升至2015年的1.69亿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户籍制度的捆绑将外来劳动者排斥在外,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使农村呈现“父母外出务工、子女留守农村”的局面(谭深,2011)。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推算出,中国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占全国农村儿童的37.70%;其中,父母双方均外出的留守儿童占比为17.62%,父亲单方外出的留守儿童占比为13.72%,母亲单方外出的占比为6.36%。在“父母双方外出”的情形中留守儿童呈低龄化趋势,6~11岁儿童占比最高,其次是5岁及以下儿童。报告反映的是全国平均状况,在偏远农村地区父母双方外出比例更高。这些留守在农村的青少年,由于缺少父母的关心和指导,遭遇负面事件冲击时,不仅应对能力弱,造成的伤害更严重,持续的时间也会更长。

2. 撤点并校与寄宿制学校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学龄儿童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将子女送到教育质量更高的县城或镇上的中小学就读,村小学和教学点的规模和数量在不断缩小。教育财政经费的负担主体由乡镇转为县级,但分税制改革削减了县级财政收入。为了提高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率,地方政府在农村推行“撤点并校”,重新整合义务教育资源。一些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上学远”和“上学难”等问题(丁冬、郑风田,2015)。作为义务教育布局调整的配套措施,建设更多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就成了解决留守儿童照料和教育的权宜之计,农村学生寄宿比例呈现攀升的趋势。在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寄宿生所占比例由2006年的19.4%上升到2015年的27.8%(如表1所示)。

离开家庭和父母不仅让小学生感到孤单无助,还会在心理上产生“被遗弃感”。开学初是寄宿小学生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一人因思念家人而在睡前哭泣,常引起满寝室的同学生哭成一片。走读生的存在使这些既沮丧又无奈的小学生时常有情感上的“相对剥夺感”。无论是向外发泄愤怒情绪,还是反复自我追问“犯了什么错,要承受这种痛苦”,都容易诱发校园欺凌现象。在城市与东部农村地区也有寄宿制学校,但这些地区

的寄宿生大多是主动选择寄宿，父母往往会定期看望孩子，如果孩子想家，回去也较为便利；而中西部农村小学生的寄宿，大多是被迫的。在回答“过去一年与母亲（父亲）见面次数”时，那些父母同时外出打工的寄宿生，有近一半的人回答“1次”或“0次”。

表1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及在校生状况

年份	学校数量(万所)	寄宿学生数(万人)	在校学生数(万人)	寄宿生占比(%)
2006	40.25	2742	14115	19.4
2007	37.95	2805	13491	20.8
2008	35.88	3067	13029	23.5
2009	33.65	3129	12674	24.7
2010	31.23	3132	12340	25.4
2011	29.53	2908	10950	26.6
2012	28.20	2710	10329	26.2
2013	26.23	2610	9598	27.2
2014	21.62	2643	9424	28.0
2015	20.54	2637	9492	27.8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历年编写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统计分析报告》整理得到。

地方政府重点建设县城和镇里的学校，因此，农村学校的青年教师会被吸引到城镇学校，而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得不到及时补充。面对学生和教师的双重流失，农村小学的校长和教师们因看不到前途而士气低落，使学校处于一种“维持状态”。在这种学校里寄宿的留守儿童不仅在学业上处于不利环境，遭遇校园欺凌时也容易被忽视，因无人帮助疏解和提供慰藉，受伤害后的影响更持久。

（二）研究假说

根据对农村环境和留守儿童家庭背景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在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的背景下，寄宿小学生因缺少家庭保护容易遭遇校园欺凌，而欺凌会降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从而阻碍了寄宿小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

基于这一假说，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相关推论：

推论1：寄宿使小学生遭遇欺凌的风险增加。

推论2：欺凌增大了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风险，如自闭、焦虑和抑郁等倾向，或导致学生出现破坏性、冲动性、攻击性和过度活跃等失范行为，对其学业产生负面影响。

推论3：教师的监护质量影响小学生遭遇欺凌的可能性。

三 数据介绍

本文使用“农村寄宿制学校调查”数据对以上三个推论进行检验。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课题组于2015年10月在河北省和四川省的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137所农村寄宿制小学展开。该调查主要关注小学生寄宿、欺凌、心理健康和学习成绩等方面的状况。根据课题组设计的抽样调查原则,这137所学校均具有寄宿资格且同时有住校生和走读生^①。最终回收有效学生问卷17676份,其中,父母同时外出务工的学生问卷4202份、学校问卷137份、班主任问卷440份以及生活老师问卷237份。我们对调查问卷中的变量作如下定义。

是否寄宿:这是区分走读生和寄宿生的关键,也是下文经验方程中的主要解释变量。调查问卷中设计的问题为“本学期是否住校”,被调查的小学生选择“是”,即为“寄宿”;选择“否”,则为“走读”。总样本中,寄宿生占63%。

遭遇欺凌得分:“农村寄宿制学校调查”的欺凌量表包含身体、言语、关系和网络4个维度。每一个题目的选项采用5级计分:0表示“完全没有”;1表示“半年内1~2次”;2表示“每月2~3次”;3表示“每周1次”;4表示“每周数次”。被访者根据最近半年的经历作答,对所有题目得分加总,即可得到欺凌得分,分数越高,遭遇欺凌越严重。这样的测量方式更适合进行标准化处理和比较。如表2所示,寄宿生得分比走读生高0.1个标准差。欺凌量表询问“这半年来,我在学校内被欺负的次数”,以“每月2~3次”为是否遭受欺凌的标准,寄宿生比走读生遭受欺凌的比例高出5.2个百分点^②。因此,寄宿生与走读生欺凌得分相差0.1个标准差,对应遭受欺凌的比例大致为5.2个百分点。

内化心理与外化心理:根据Achenbach(1991)编制的“6~18岁儿童行为检查清单”(Child Behavior Checklist/6~18,简称CBCL)量表^③,该调查选取内化心理部分

① 课题组从教育部学生体质系统上获得样本县所有小学名单,并根据教育局提供的学校基本信息,将非寄宿学校和完全封闭寄宿制学校排除,将4~5年级学生总数低于20人、住校生低于10人的学校排除。将满足标准的学校4~5年级作为样本框。如果每个年级的班级数小于3,则调查所有班级;如果班级数大于3,则随机抽取2个班级作为调查对象。

② 在所有样本里,如果以“每月2~3次或者更多”视为卷入校园欺凌,则校园欺凌的比例约为40%,远高于发达国家报告的数字。

③ 该量表分为三部分:家长/监护人问卷、教师问卷和学生自填问卷。量表问题旨在测量儿童内化心理特征、外化心理特征以及社会交往能力。请参见 <http://www.netsn.org/content/child-behavior-checklist-ages-6-18>。

测量抑郁、焦虑和退缩 3 方面的问题；选取外化心理部分测量破坏性、冲动性、攻击性和过度活跃 4 方面的问题。个体得分越高，心理失调的风险越高。如表 2 所示，与走读生相比，寄宿生的内化心理得分高出 0.09 个标准差，外化心理得分高出 0.07 个标准差。

阅读成绩：该调查采用国际儿童阅读能力测试机构在 2011 年设计的“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简称 PIRLS）阅读测试工具^①，现场测试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并将其成绩转化成标准分。成绩样本均值为 80.15，标准差为 7.65。如表 2 所示，寄宿生比走读生得分低了 0.07 个标准差，这意味着，寄宿生比走读生阅读成绩低了 0.54 分。

从表 2 提供的其他描述性统计信息看出，与走读生相比，寄宿生有更轻的体重、更低的身高、父母婚姻关系失常的比例更高且父母的受教育年限也更少。总体来说，寄宿生在身体发育、心理健康以及家庭环境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

表 2 统计描述

	走读	寄宿	走读 - 寄宿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差异(标准差)
遭遇欺凌得分(标准化)	-0.07 (0.99)	0.03 (1.00)	-0.10*** (0.02)
内化得分(标准化)	-0.05 (0.99)	0.04 (0.98)	-0.09*** (0.02)
外化得分(标准化)	-0.05 (0.98)	0.02 (0.98)	-0.07*** (0.02)
阅读得分(标准化)	0.08 (0.98)	0.01 (0.99)	0.07*** (0.02)
家校距离(公里)	2.69 (6.54)	6.38 (8.93)	-3.69*** (0.13)
性别(男性=1)	0.48 (0.50)	0.51 (0.50)	-0.03*** (0.01)
年龄(岁)	9.90 (0.84)	10.02 (0.86)	-0.12*** (0.01)

① 该项目于 2001 年对全球 35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第一轮阅读素养测评，每 5 年开展一轮测试，2006 年（第二轮）中国首次参与该项目。PIRLS 将 9 岁左右的学生作为测试对象，被测试者大部分为四年级，9~10 岁是儿童阅读能力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大多数国家要求四年级末的学生知道如何阅读，并通过阅读来进行学习。详细介绍请参见项目官网 <https://timss.bc.edu/>。

续表

	走读	寄宿	走读 - 寄宿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差异(标准误)
体重(公斤)	33.05 (8.06)	32.69 (7.48)	0.36*** (0.12)
身高(厘米)	138.49 (7.88)	138.27 (7.67)	0.22* (0.13)
年级(五年级 = 1)	0.46 (0.50)	0.52 (0.50)	-0.06*** (0.01)
父母婚姻状况(1 = 在婚)	0.91 (0.29)	0.88 (0.33)	0.03*** (0.01)
父亲受教育年限	9.54 (2.83)	9.06 (2.62)	0.48*** (0.04)
母亲受教育年限	9.09 (0.04)	8.76 (0.03)	0.33*** (0.05)
在校生规模(人)	740.54 (6.00)	658.32 (4.32)	82.22*** (7.27)
观测数	6120	10323	16443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课题组2015年10月收集的学生问卷信息计算得到。

四 研究策略

(一) 寄宿对小学生欺凌得分的影响

为检验寄宿对小学生遭遇欺凌风险的影响，本文设定的经验方程为：

$$Bullied_{ij} = \alpha_1 Board_{ij} + \tau_1 X_i + \omega_1 C_k + \theta_{1,ij} \quad (1)$$

$Bullied_{ij}$ 为小学生*i*在学校*j*遭遇欺凌的得分； $Board_{ij}$ 为该学生“是否寄宿”， α_1 是寄宿对遭遇欺凌的影响系数，我们预期 α_1 为正，即寄宿会增加遭遇欺凌的风险。控制变量 X_i 含小学生的个体特征、父母的相关特征以及老师或学校特征。每个县会有无法观测的固定效应 C_k ，该因素也会影响校园欺凌。 $\theta_{1,ij}$ 为随机误差项。

选择寄宿并非随机决定的，寄宿与欺凌间存在选择性偏差，需要处理内生性以减少估计偏差。本文采用“家校距离”（取对数）作工具变量，以控制（估计）寄宿对欺凌影响时存在的选择性偏差。对小学生来说，家校距离是影响寄宿决策的重要因素。住校生在自我报告住校原因时，61%的学生选择“我家离学校太远”。家庭距离学校的远近可以视为外生的。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将式（1）拓展为两阶段估计，经验方程设定如下：

$$Board_{ij} = \beta D_{ij} + \kappa X_i + \sigma C_k + \xi_{ij} \quad (2)$$

$$Bullied_{ij} = \alpha_2 Board_{ij} + \tau_2 X_i + \omega_2 C_k + \theta_{2,ij} \quad (3)$$

式（2）为第一阶段的约简方程， D_{ij} 表示“家校距离”对数；式（3）中 α_2 表示控制了选择性偏差后，寄宿对遭遇欺凌的影响系数。

（二）遭遇欺凌对小学生心理和学习成绩的影响

为了检验欺凌是否增大了小学生心理健康风险以及这些风险会对其学业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设定如下方程：

$$Y_{ij} = \gamma Bullied_{ij} + \varepsilon X_i + \varphi C_k + \varepsilon_{ij} \quad (4)$$

Y_{ij} 表示内化心理、外化心理和学习成绩的得分。遭遇欺凌与心理健康和学习成绩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式（4）中 γ 未必是欺凌对 Y_{ij} 的真实影响，可以看作是个相关关系； X_i 和 C_k 的定义同式（1）； ε_{ij} 为随机误差项。

（三）师资、责任心与校园欺凌

为了检验教师监护质量对小学生遭遇欺凌的影响，本文以教师的学历代表师资质量，观察教师学历变化对校园欺凌的影响，设定如下方程：

$$B_ratio_{nj} = \rho edu_{nj} + \varepsilon Z_n + \pi C_k + \omega_{nj} \quad (5)$$

B_ratio_{nj} 为班主任对应的班级欺凌发生率，下标 n 表示教师， j 表示学校， edu_{nj} 为班主任的学历水平， Z_n 为班主任的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等控制变量。系数 ρ 表示班主任的学历水平对欺凌发生率的影响，预计该系数为负，即班主任学历越高，欺凌发生率下降幅度越大。这个方程也可以用于分析生活老师对学校住校生欺凌发生率的影响。

五 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对遭遇欺凌得分、内化心理和外化心理得分和阅读成绩的被解释变量，在回归分析中按照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方式，进行正态标准化处理，使对估计结果的解释具有可比性。

（一）寄宿增加了遭遇欺凌的风险

1. 寄宿对小学生遭遇欺凌的总体影响

对方程（1）的估计结果，报告在表3中。第（1）列为基础方程，仅控制县固定效应，主变量系数为0.11，统计显著，可解读为寄宿显著增大了遭遇欺凌的风险，寄宿生比走读生的得分高出0.11个标准差。为准确评估寄宿对遭遇欺凌的影响，在扩展

方程里,第(2)列控制了小学生的个人特征,这时,寄宿的系数略有下降,为0.10,统计上非常显著。第(3)列进一步控制了被调查者的家庭特征,寄宿的系数为0.10,显著性不变。第(4)列进一步增加控制了学校特征,“寄宿”对遭遇欺凌的影响系数为0.09,统计显著性不变。从第(1)~(4)列的估计结果看出,寄宿不仅显著增大了被调查小学生遭遇校园欺凌的风险,而且系数非常稳健。

表3 寄宿对欺凌的影响效应(被解释变量:遭遇欺凌得分)

解释变量	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工具变量估计			
	(1)	(2)	(3)	(4)	(5)	(6)	(7)	(8)
是否寄宿	0.11*** (0.02)	0.10*** (0.02)	0.10*** (0.02)	0.09*** (0.02)	0.22*** (0.06)	0.21*** (0.06)	0.21*** (0.06)	0.21*** (0.06)
性别(男性=1)		0.22*** (0.02)	0.22*** (0.02)	0.22*** (0.02)		0.22*** (0.02)	0.22*** (0.02)	0.22*** (0.02)
年龄		0.06*** (0.01)	0.05*** (0.01)	0.06*** (0.01)		0.05*** (0.01)	0.05*** (0.01)	0.05*** (0.01)
年级(五年级=1)		-0.08*** (0.03)	-0.08*** (0.03)	-0.08*** (0.03)		-0.08*** (0.03)	-0.08*** (0.03)	-0.08*** (0.03)
体重(公斤)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身高(厘米)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父亲受教育年限			0.01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0.00)
母亲受教育年限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父母婚姻是否正常(是=1)			-0.16*** (0.03)	-0.16*** (0.03)			-0.15*** (0.03)	-0.15*** (0.03)
学校在校生规模(对数)				-0.04 (0.03)				-0.03 (0.03)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16443	16443	16443	16443	16443	16443	16443	16443
R ²	0.03	0.04	0.05	0.05	0.02	0.04	0.04	0.04
第一阶段F值					3766	3673	3627	3736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学校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课题组2015年10月收集的学生问卷信息计算得到。

接着,本文将经验方程拓展为两阶段估计,用“家校距离”的对数值作工具变量,以减轻选择性偏差对准确测量的干扰,估计结果为第(5)~(8)列。第(5)列为基础方程,仅控制县固定效应,“寄宿”对遭遇欺凌的影响系数为0.22,统计上非常显著。第(6)列进一步控制了学生个人特征,系数为0.21,同样非常显著。第(7)列

进一步控制了被调查者的家庭特征，系数与第（6）列相比没有差异。第（8）列进一步增加控制了学校特征后，系数为 0.21，统计上仍然显著。两阶段估计的系数比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值增大了约一倍，与大多数经验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Card, 1999）。“寄宿”的估计系数对方程设定形式不敏感，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寄宿使小学生遭遇欺凌的风险提高了 0.1~0.2 个标准差，即遭受欺凌的概率高出 5~10 个百分点。

根据调查问卷设计的测量内容，校园欺凌可分为以下 3 类：语言欺凌，即被人背地说坏话、辱骂、言语威胁；关系欺凌，即遭遇冷暴力，如被排挤和孤立；身体欺凌，即被人强迫做事（如打扫卫生、买东西和写作业等）、推挤或绊倒以及财物遭到勒索。按照表 3 中的方程设定形式，我们分别考察寄宿对上述各种欺凌类型得分的影响。结果报告在表 4 中。

表 4 寄宿对遭遇欺凌的影响

	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工具变量估计			
	(1)	(2)	(3)	(4)	(5)	(6)	(7)	(8)
窗格 A 语言欺凌得分								
寄宿	0.10 *** (0.02)	0.09 *** (0.02)	0.09 *** (0.02)	0.08 *** (0.02)	0.18 *** (0.05)	0.16 ** (0.05)	0.16 *** (0.05)	0.16 *** (0.05)
R ²	0.01	0.02	0.02	0.03	0.01	0.02	0.02	0.02
第一阶段 F 值					3766	3673	3627	3736
窗格 B 关系欺凌得分								
寄宿	0.10 *** (0.02)	0.09 *** (0.02)	0.09 *** (0.02)	0.09 *** (0.02)	0.18 *** (0.05)	0.17 *** (0.05)	0.17 *** (0.05)	0.17 *** (0.05)
R ²	0.03	0.04	0.05	0.05	0.03	0.04	0.04	0.04
第一阶段 F 值					3766	3673	3627	3736
窗格 C 身体欺凌得分								
寄宿	0.10 *** (0.02)	0.10 *** (0.02)	0.10 *** (0.02)	0.09 *** (0.02)	0.24 *** (0.05)	0.23 *** (0.06)	0.23 *** (0.06)	0.23 *** (0.06)
R ²	0.04	0.05	0.05	0.05	0.03	0.04	0.05	0.05
第一阶段 F 值					3766	3673	3627	3736
观测数	16443	16443	16443	16443	16443	16443	16443	16443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学校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被解释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第（1）~（4）列及第（5）~（8）列的模型设定同表 3。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课题组 2015 年 10 月收集的学生问卷信息计算得到。

表 4 的窗格 A 报告了寄宿对语言欺凌得分的影响。第（1）~（4）列为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与走读生相比，寄宿生遭受语言欺凌得分要高出 0.08~0.10 个标准差，统计上非常显著；第（5）~（8）列为采用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寄宿生遭受语言欺凌的得分

要比走读生高出 0.16~0.18 个标准差,统计上显著。结合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和工具变量估计的系数可以判断出,寄宿使小学生遭受语言欺凌的可能性增加了 4.68~9.36 个百分点。

表 4 的窗格 B 报告了寄宿对关系欺凌得分的影响。在第 (1)~(4) 列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中,寄宿对遭受关系欺凌得分的影响介于 0.09~0.10 个标准差之间,统计上非常显著。第 (5)~(8) 列的两阶段估计系数显示,寄宿对遭遇关系欺凌的得分影响在 0.17~0.18 个标准差之间,统计上也非常显著。不同的估计结果显示,寄宿使小学生遭受关系欺凌的概率增加了 4.68~9.36 个百分点。

表 4 的窗格 C 报告了寄宿对身体欺凌得分的影响。第 (1)~(4) 列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显示,寄宿使小学生遭遇身体欺凌的风险提高了 0.09~0.10 个标准差;在第 (5)~(8) 列的两阶段估计结果中,寄宿生遭遇身体欺凌得分提高了 0.23~0.24 个标准差。两种估计方法得到的系数都在 1% 统计上显著。显然,寄宿对小学生遭受身体欺凌的影响更大,可能性增加 4.68~12.48 个百分点。

从表 4 的估计结果看出,寄宿增加了小学生遭受语言欺凌、关系欺凌和身体欺凌的可能性,与表 3 报告的欺凌总体得分结果相一致。从系数大小看,遭受身体欺凌的系数更大,这反映出发生在小学生之间的校园欺凌以肢体冲突为主。这类校园欺凌是明显可见的,如果学校管理者愿意重视,这类欺凌也是最容易得到及时干预和制止的。

2. 低龄寄宿

不同的农村地区撤点并校的力度不同,有些乡镇撤销所有村小和教学点,只保留一所中心小学,因此,如果家校距离远,小学生可能从一年级就开始寄宿;有些乡镇撤并力度小,小学生就可在本村上完一、二年级^①。值得注意的是,三年级开设英语课程,而农村英语教师极为短缺,因此,英语课程通常在乡镇中心小学开设。这意味着,到了三年级小学生就要集中到乡镇中心小学就读并寄宿。我们将调查样本中二年级(含二年级)以前开始寄宿的情形称为“低龄寄宿”;三年级(含三年级)以后开始寄宿的情形,称为“非低龄寄宿”。如果寄宿容易导致欺凌,可以预期,低龄寄宿者遭遇校园欺凌的可能性更大。考虑到寄宿的选择性偏差,在此仍以家校距离(对数值)作工具变量,以控制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差。模型设定如表 3 和表 4 中的第 (4) 列和第 (8) 列,控制了个体、家庭和环境等变量。估计结果报告在表 5 中。

^① 样本中有 4199 名 (26.25%) 小学生一年级住校,5004 名 (31.31%) 小学生二年级时住校,一、二年级住校人数略有增加。三年级时住校的被访者人数增加至 8832 人 (55.18%)。由于小学生三年级需要集中到乡镇中心小学就读,家校距离远的学生只能选择寄宿。

表 5 寄宿经历与遭受欺凌

	有低龄寄宿经历(参照组:从未寄宿)		非低龄寄宿(参照组:从未寄宿)	
	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工具变量估计	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工具变量估计
	(1)	(2)	(3)	(4)
窗格 A 遭遇欺凌得分				
寄宿	0.12 *** (0.03)	0.19 ** (0.07)	0.09 *** (0.02)	0.18 *** (0.06)
R ²	0.05	0.05	0.04	0.04
第一阶段 F 值		2660		2520
窗格 B 语言欺凌得分				
寄宿	0.08 *** (0.03)	0.13 ** (0.06)	0.08 *** (0.02)	0.14 *** (0.05)
R ²	0.03	0.03	0.02	0.02
第一阶段 F 值		2660		2520
窗格 C 关系欺凌得分				
寄宿	0.10 *** (0.03)	0.18 *** (0.06)	0.08 *** (0.02)	0.14 ** (0.06)
R ²	0.05	0.05	0.04	0.04
第一阶段 F 值		2660		2520
窗格 D 身体欺凌得分				
寄宿	0.12 *** (0.03)	0.22 *** (0.07)	0.08 *** (0.03)	0.20 *** (0.06)
R ²	0.05	0.06	0.05	0.04
第一阶段 F 值		2660		2520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学校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无低龄寄宿经历”是指目前处于寄宿状态，从三年级以后开始寄宿；样本中，“从未寄宿”者的观测数为5472个，“有低龄寄宿经历”者的观测数为4361个，“无低龄寄宿经历”者的观测数为6348个；“从未寄宿”群体为参照组。第（1）列和第（2）列观测值为“有低龄寄宿经历”与“从未寄宿”观测值之和；第（3）列和第（4）列观测值为“无低龄寄宿经历”与“从未寄宿”观测值之和。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课题组2015年10月收集的学生问卷信息计算得到。

表5中第（1）列与第（3）列显示，有低龄寄宿经历者遭受欺凌得分高出0.03个标准差，遭遇关系欺凌得分要高出0.02个标准差，身体欺凌得分高出0.04个标准差；而在语言欺凌得分方面无差异。第（2）列和第（4）列的工具变量估计系数给出了同样的方向和显著性。这意味着，低龄寄宿经历使小学生更可能遭遇欺凌，尤其是在遭受关系欺凌和身体欺凌方面，风险最高。但是，遭遇风险也给有低龄寄宿经历的小学生增加了处理难题的实践机会，这是一种“疗救”。当他们升入四、五年级时，与非低龄寄宿者之间的得分差异被缩小了。

(二) 欺凌对学生心理和学业的影响

为了考察遭遇欺凌对小学生心理和学业的影响,根据调查问卷中设计的问题,我们提炼出三个指标:反映心理健康的内化得分、外化得分以及反映认知能力的现场阅读测试成绩。按照与表3同样的控制变量添加顺序,我们采用最小二乘估计,将回归分析结果报告在表6中。窗格A显示了外化得分情况,第(1)列是基础方程,欺凌得分增加1个标准差,外化心理得分增加0.33个标准差,第(2)~(4)列逐步增加控制变量后,估计系数略有下降,但稳定在0.31~0.32之间,统计上非常显著。

表6 欺凌对学生心理和学业的影响

	(1)	(2)	(3)	(4)
窗格 A 外化得分				
遭遇欺凌得分	0.33 *** (0.01)	0.32 *** (0.01)	0.32 *** (0.01)	0.31 *** (0.01)
R ²	0.12	0.13	0.13	0.13
窗格 B 内化得分				
遭遇欺凌得分	0.28 *** (0.01)	0.28 *** (0.01)	0.28 *** (0.01)	0.28 *** (0.01)
R ²	0.08	0.09	0.09	0.09
窗格 C 阅读得分				
遭遇欺凌得分	-0.19 *** (0.01)	-0.19 *** (0.01)	-0.18 *** (0.01)	-0.18 *** (0.01)
R ²	0.09	0.11	0.11	0.11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			是	是
学校特征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16674	16674	16674	16674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学校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年级、身高和体重;家庭特征包括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和父母婚姻状况;学校特征包括在校规模。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课题组2015年10月收集的学生问卷信息计算得到。

窗格B显示了内化得分情况。第(1)列的结果显示,遭遇欺凌得分增加1个标准差,会使内化得分提高0.28个标准差,统计上非常显著。在扩展方程里,这个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都没有变化。这意味着,遭遇校园欺凌给学生心理造成的伤害并未因家庭和学校的因素减轻。我们推测,学校和家庭并未对校园欺凌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必

要的干预和帮助，使受害者尽快从心理障碍中摆脱出来。

窗格 C 显示了欺凌与阅读得分之间的关系。在第 (1) 列的基础方程中，遭遇欺凌得分每提高 1 个标准差，阅读得分会下降 0.19 个标准差。在第 (2) ~ (4) 列扩展方程中，这个系数在大小和显著性上，一直稳定在 0.18 ~ 0.19 个标准差之间。

从以上分析可以判断，欺凌给小学生带来了显著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学习问题。这些心理问题会对他们的学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成绩差和厌学的状况。这些学生表现出来的自暴自弃使他们处于一种“自我孤立”的“隐形辍学”状态，又进一步引致老师和同学的厌恶、疏远和歧视。这种被排斥状态使他们承受持续的心理痛苦，部分学生会初中阶段辍学，这是人力资本投资进程的中断。

内化心理和外化心理包含了不同的外部表现形式，我们采用 OLS 估计遭遇欺凌对它们的影响，模型设定如表 6 的第 (4) 列，将每个估计系数展示在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出，遭遇欺凌对小学生外化心理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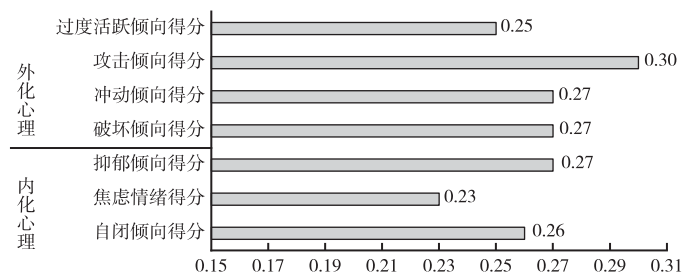


图 1 欺凌对不同心理维度的影响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课题组 2015 年 10 月收集的学生问卷信息计算得到。

遭遇欺凌的小学生向外部释放负面情绪表现出一种“侵略性”，可以观察到他们显示出“过度活跃”、“攻击性”、“冲动”和“破坏”等行为。在外化心理中，遭遇欺凌对攻击倾向的影响系数为 0.30，对冲动倾向和破坏倾向的影响系数均为 0.27，对过度活跃倾向的影响系数为 0.25。遭遇欺凌后，小学生会产生沮丧情绪和挫折感，成为一种向内的负面影响，表现为“抑郁”、“焦虑情绪”以及“自闭”等倾向。回归结果显示，遭遇欺凌对抑郁倾向的影响系数为 0.27，对焦虑情绪的影响系数为 0.23，对自闭倾向的影响系数为 0.26。这种内化心理表现为闷闷不乐、内心抑郁以及不愿与人交流。

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学校管理者如果能及时发现学生之间的欺凌现象并予以制止，就能缓解甚至阻断心理问题的形成和积累，保护青少年免于心理健康风险。

（三）治理校园欺凌的方向：改善师资和加强教师的责任心

农村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对校园欺凌不能及时发现和化解，使农村校园欺凌发生得更频繁，产生的后果更严重和持久。在学生数量持续减少，青壮年教师设法调离的背景下，学校管理者无论是能力还是责任心都难以有效应对校园欺凌，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区分“嬉戏打闹”与“恶意欺凌”。这些校长和班主任掩盖校园欺凌的激励可能比解决校园欺凌的激励更强。当遭遇欺凌时，只有6.12%的小学生选择“会告诉老师，寻求老师帮助”，远低于“让家人到学校替我解决”（51%）、“我会直接报复欺负我的人”（11.66%）和“默默忍受，谁也不告诉”（25.62%）的比例。

青少年的成长离不开成年人的监护和指导，在寄宿制学校中，生活老师充当了寄宿生的监护人。他们直接照顾寄宿生的生活起居，培养其生活习惯和自理能力。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农村寄宿制学校没有生活老师的编制和专项资金，生活老师主要由退休教师、教职工家属、学生家长甚至学校驻地村民来担任，属于临时工性质。生活老师也缺少相关的专业技能。Yue et al.(2014)通过对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老师进行培训发现，生活老师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后，显著改善了寄宿生的健康和学业表现。

我们用生活老师的受教育水平来解释所在学校的寄宿生欺凌发生率^①，回归结果报告在表7中。第（1）列是基础方程的估计结果，以“初中及以下”群体为参照组，观察更高学历的群组是否有更低的校园欺凌发生率。结果显示，生活老师的学历越高，寄宿生欺凌发生率越低。在第（2）~（4）列的扩展方程里，增加控制了生活老师的个人特征、是否有正式编制以及工作年限后，“中专、中师或高中”和“大专”的系数与第（1）列结果接近，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系数下降幅度十分明显。

根据以上结果，我们可以做个推测性的判断：如果生活老师由本科学位的老师来担任，寄宿生欺凌发生率能下降15~31个百分点；如果在农村寄宿制学校配置大专学历的生活老师，校园欺凌发生率能下降12~17个百分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存在和建设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防范校园欺凌，保护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教育部门应当对“生活老师”这个群体进行关注和帮助，包括设定师资准入门槛、拨付专门经费、定期提供岗位培训提升业务水平等。

^① 采用欺凌量表中询问“过去半年中，你欺负别人的次数”和“过去半年中，你被别人欺负的次数”；其中，任何一个题目选择“每月至少2~3次”或更多，即认为该学生卷入欺凌；按照该标准，将卷入欺凌的学生个数除以学生总数即可得到欺凌发生率，样本中总的欺凌发生率为40%。

表7 生活老师状况与学校住校生欺凌发生率

生活老师状况	(1)	(2)	(3)	(4)
寄宿生欺凌发生率				
本科及以上	-0.15 ** (0.06)	-0.26 *** (0.07)	-0.31 *** (0.07)	-0.31 *** (0.07)
大专	-0.12 *** (0.04)	-0.12 *** (0.04)	-0.16 *** (0.05)	-0.17 *** (0.05)
中专、中师或高中	-0.12 *** (0.03)	-0.08 ** (0.03)	-0.09 ** (0.04)	-0.09 ** (0.04)
年龄		-0.01 *** (0.00)	-0.01 *** (0.00)	-0.01 *** (0.00)
性别(男性 = 1)		0.06 (0.04)	0.03 (0.05)	0.03 (0.05)
无正式编制			-0.08 (0.05)	-0.08 (0.05)
工作年限				-0.00 (0.00)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231	231	231	231
R ²	0.20	0.28	0.29	0.29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生活老师学历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参照组。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课题组2015年10月收集的生活老师问卷和学生问卷信息计算得到。

在寄宿制学校中，班主任通常是小学生接触最多的监护人，他们的管理能力和责任心决定了班级的整体环境和纪律状况，这是影响欺凌发生率的重要因素。班主任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性可通过其受教育水平体现出来，估计结果显示，班主任学历水平越高，班级欺凌发生率越低（见表8）。问卷中设计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份高薪的工作机会，你会不会离开教师岗位”，420名班主任中有72%的人选择“不会离岗”。如果将这个选项作为班主任责任心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有责任心的班主任其班级欺凌发生率也更低，比参照组降低了3~4个百分点。

2010年以来，中西部省份实行“特岗教师计划”，为乡村学校提供大量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年轻教师，改善农村学校的师资。由于受教育水平高，知识结构新，在班级管理方面，这些年轻教师更注重素质教育。为了有效防范农村小学的校园欺凌，要为这些年轻的特岗教师提供激励与培训，鼓励他们更多地担任班主任。此外，提高班主任的责任心能直接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要有针对班主任的专门培训和激励，将防范校园欺凌作为重要内容，通过提升班主任的专业技能和责任心，实现校园欺凌的综合治理。

表8 班主任状况与班级欺凌发生率

班主任状况 \ 班级欺凌发生率	(1)	(2)	(3)	(4)	(5)
本科及以上	-0.07*** (0.03)		-0.05* (0.03)		-0.05** (0.03)
有高薪机会, 不会离岗		-0.04*** (0.01)		-0.03** (0.01)	-0.03** (0.01)
性别(男性=1)			0.03** (0.01)	0.03** (0.01)	0.03** (0.01)
年龄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工作年限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420	420	420	420	420
R ²	0.31	0.31	0.32	0.32	0.33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班主任学历以“大专以下学历”为参照组。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课题组2015年10月收集的班主任问卷和学生问卷信息计算得到。

六 总结

农村小学的校园欺凌问题是中国当前特定的发展阶段的产物, 是由城乡分割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到城市寻求高收入机会的农村劳动力无法突破户籍制度障碍, 成为候鸟式流动的“农民工”, 留守儿童数量长期居高不下。在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的过程中, 农村家庭也在设法为子女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于是, 更多的青少年到县城或镇上的学校求学, 农村学校的数量和规模不断缩小。一方面, 学生的数量在减少; 另一方面, 教师和校长在设法调往城市的学校。即使愿意坚守农村学校, 大多数校长和教师面对持续的“人员流失”也是沮丧的、动摇的。比起学校能否生存下去这样的大问题, 校园欺凌是个几乎引不起他们关注的“小问题”^①。

本文使用5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调查数据, 研究了寄宿对小学生遭

^① 课题组访谈了很多当前规模在缩小的学校的校长, 在面对“学校的未来”这个问题时, 这些校长的回答几乎都是一致的。正如一位校长所说, “这不是我能考虑的事情, 这是政府的事情。如果学校没人了, 停办了, 合并了, 教育局会为我重新安排岗位的。”

遇欺凌的影响，发现寄宿增加了小学生遭遇欺凌的风险，而欺凌则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学业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要特别指出的是，中西部农村儿童到学校寄宿不仅仅是个人选择，背后有着特殊的环境因素。城市也有寄宿制学校，东部也有寄宿制学校，但校园欺凌问题却不那么严重。中西部农村学校面临的难题，通过寄宿和欺凌反映出来，而不是说发展寄宿制学校本身导致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在研究的技术层面，寄宿与欺凌，欺凌与心理健康、学习成绩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文尝试用工具变量方法来减轻内生性导致的偏差，但由于使用的数据为一期截面观测性数据，数据的限制使我们得出的结论仅仅是建议性的，而不是因果性的。

在留守儿童数量众多和农村小学质量下降的背景下，中西部农村小学的校园欺凌是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也是影响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性细节”。留守和寄宿儿童不但要忍受与父母分离的痛苦，还要面对遭遇校园欺凌的风险。如果在农村小学形成了相互伤害的伙伴关系，卷入其中的同学，其学业和心理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使更多青少年过早放弃学业，成为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中央政府在着力推进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时，要关注制约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学习成绩的因素，这些易被校长和老师忽视的“小事”，却真正影响了一部分学生的学业和升学，决定了他们能跑多远。可以说，中央政府下一阶段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

主动欺负他人的学生应该成为主要的干预对象。欺负别人是一种负面情绪的发泄，比起被动遭遇欺凌的学生，他们的暴力倾向如果得不到及时制止，就会固化为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即通过暴力与胁迫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意愿。这不仅给同伴带来直接的伤害，从长期看，他们自身也成为受害者。比如，角色认同上，把自己定位为失败者、不受欢迎者，难以融入班级集体。这个群体的心理障碍和厌学心理比受欺凌者更加严重。初中阶段辍学风险高的群体，既包括那些遭受欺凌的同学，也包括那些主动欺凌别人的同学。主动欺凌他人者，成年后的犯罪风险似乎更高（张丹丹等，2014）。

本文发现，班主任和生活老师的学历和责任心与欺凌发生率显著负相关，因此，我们尝试从班主任和生活老师的工作能力与责任心两方面探讨降低校园欺凌风险的途径。毕竟发生在校园里的欺凌主要依靠校长和教师等成年人来解决。然而，加强农村小学的师资力量可能是个短期应对措施，更根本的制度性改革还是要打破城乡壁垒，切实推进深度城镇化，让更多的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和寄宿生。在农村学校学生数量减少以及学校不断萎缩和关闭的背景下，如何让坚守农村学校的校长和教师鼓舞士气、树立责任心，是一个更加迫切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 丁冬、郑风田 (2015), 《撤点并校: 整合教育资源还是减少教育投入? ——基于 1996 - 2009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经济学 (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 第 603 - 622 页。
- 全国妇联课题组 (2013),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中国妇运》第 6 期, 第 30 - 34 页。
- 谭深 (2011),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 《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第 138 - 150 页。
- 张丹丹、王也、Xin Meng & Lisa Cameron (2014), 《农民工犯罪类别的决定因素——基于监狱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 (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 第 83 - 112 页。
- Achenbach, Thomas (1991). *Manual for the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4 - 18 and 1991 Profile*. Burlington: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University of Vermont.
- Agnew, Robert (1992).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30(1), 47 - 88.
- Card, David (1999). Chapter 30-The Causal Effect of Education on Earning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ume 3, Part A, 1801 - 1863.
- Drydakis, Nick (2013). Bullying at School and Labour Market Outcomes.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7432.
- Heckman, James (2008). Schools, Skills, and Synapses. *Economic Inquiry*, 46(3), 289 - 324.
- Heineck, Guido & Silke Anger (2010). The Returns to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in Germany. *Labour Economics*, 17(3), 535 - 546.
- Klomek, Anat Brunstein, Andre Sourander & Henrik Elonheimo (2015). Bullying by Peers in Childhood and Effects on Psychopathology, Suicidality, and Criminality in Adulthood. *The Lancet Psychiatry*, 2(10), 930 - 941.
- Olweus, Dan (1997). Bully/Victim Problems in School: Facts and Interven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2(4), 495 - 510.
- Ouellet-Morin, Isabelle, Candice Odgers, Andrea Danese, Lucy Bowes, Sania Shakoor, Andrew Papadopoulos, Avshalom Caspi, Terrie Moffitt & Louise Arseneault (2011). Blunted Cortisol Responses to Stress Signal Soci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Among Maltreated/Bullied 12-Year-Old Children. *Biological Psychiatry*, 70(11), 1016 - 1023.
- Sigurdson, Johannes Foss, Anne Mari Undheim, Jan Wallander, Stian Lydersen & Anne

- Mari Sund (2015).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Being Bullied or a Bully in Adolescence on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Adulthood.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 Mental Health*, 9(1), 42 – 55.
- Sourander, Andre, Brunstein Klomek, Kumpulainen Kirsti, Puustjärvi Anita, Elonheimo Henrik, Ristkari Terja, Tamminen Tuula, Moilanen Irma, Piha Jorma & Ronning John (2011). Bullying at Age Eight and Criminality in Adulthood: Findings from the Finnish Nationwide 1981 Birth Cohort Study.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46(12), 1211 – 1219.
- Yue, Ai, Yaojiang Shi, Fang Chang, Chu Yang, Huan Wang, Hongmei YI, Renfu Luo, Chengfang Liu, Linxiu Zhang, James Yanjey Chu & Scott Rozelle (2014). Dormitory Management and Boarding Students in China's Rural Primary Schools.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6(3), 523 – 550.

Influence of School Bullying and Policy Response : Evidence from Rural Boarding Primary Schools

Wu Yaowu¹ & Hou Haibo²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¹;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²)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adjustment of the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resourc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rural children have fewer choice but to be enrolled at boarding schools, especially those left-behind children who are separated from their parents. This paper draws upon the data of the sampling survey of 137 rural boarding primary schools which was conduc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and other joint research groups in October 2015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hool bullying in primary school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bullying on students' study and mental health. We find that boarding students in particular those young kids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volved into school bullying. Bullying has an obviously negative impact on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study performa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rategy to reduce bullying on camp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teacher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ei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school bullying, boarding, left-behind children, mental health, human capital

JEL Classification: D90, I25, J13

(责任编辑：王永浩)